

# 市场无边界：浅析快递配送从业者的困境

**摘要：**快递配送从业者是“互联网+服务业”与“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但他们因行业发展、社会文化与自身需求等各方面原因陷入生存困境。究其根本，乃市场逻辑的泛滥。欲改变市场无边界的现状，既需要宏观层面的规制，又需要从业者与消费者个体层面的改变。

**关键词：**快递；网约配送；权益保障；异化劳动理论；经济伦理学

作为“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快递外卖配送从业者以劳作连接网络与现实，连通卖家与买家。数百万鲜活的个体，加入物流行业的网络，支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疫情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快递外卖配送从业者“冒疫奔忙”<sup>①</sup>，勇担重任，成为“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摆渡人”。辛劳至此，却鲜有人过问他们并不乐观的生存境况。

过劳问题最为显而易见。奔波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快递配送从业者工作时长、劳动强度大，鲜有自由时间照顾自己、陪伴家人。一份基于北京市 1214 名快递员的调查指出，超时劳动情况在快递员群体中普遍存在。在调查对象中，日均工作时长在 10 小时及以上的占比过半，超八成认同“我常因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伴或照顾恋人（家人）”，绝大多数快递员自我感知的疲劳程度较高<sup>②</sup>。此外，权益难得保障、社会融入不强则是更为隐匿的困扰。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对全国范围内 3 万余名外卖骑手的问卷调查，该群体的主要诉求包括收入保障，让劳动付出与回报更为匹配；获得劳动尊重，优化劳动条件；提升保障水平，扩大社保范围等<sup>③</sup>。无论是机制、人群还是自身，给予的关怀都较少，与其付出难成正比。而这样的局面，又因种种原因成为困境，成为无解的题。

## 一、困境从何而来？

从快递配送行业的发展机制到社会关怀，再到从业者自身的愿望，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述困境。

<sup>①</sup>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 年 09 月 09 日 02 版。

<sup>②</sup>林原、李晓晖、李燕荣：《北京市快递员过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1214 名快递员的调查》，载《中国流通经济》，2018 年第 32 期。

<sup>③</sup>孙洁：《快递配送青年权益保障现状、瓶颈与对策建议》，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 年第 1 期。

就快递配送行业发展机制而言,对于快递配送从业者的保障力度与关怀照料是欠缺的。以快递业为例,快递业主要经营模式分为直营模式与加盟模式。采用直营模式的企业把控整个快递网络,从总部到终端均自行建设。这类企业通常与快递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对较好。而采用加盟模式的快递企业总部则采用深度外包。由于用工责任层层转移,行业整体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存在争议时,快递员与快递公司、加盟商之确认劳动关系难度较大,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对较差<sup>①</sup>。由此见得,多数情况下,快递配送行业的从业者劳动关系契约化程度较低,“自我雇佣”观念流行,社会保障程度欠佳。此外,企业因为脱离了传统的雇主身份,所以也脱离了传统的劳工关系,其管理机制难以规范,对员工的凉薄与压榨也在“自我雇佣”的幌子下显得更为隐匿与窒息。布若威在《制造同意》一书中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语境下,资方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通过意识形态支配实现的。而在快递配送行业中,企业正是通过“赶工游戏”的机制以完成生产<sup>②</sup>。在“赶工游戏”中,劳动者参与到基于计件工作的游戏中,被迫同意游戏规则,并服从秩序,这无疑是企业的一种变相的压榨。故总体而言,快递配送行业作为新的经济业态,存在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虽然已有一系列关于快递配送行业的法律法规出台<sup>③</sup>,但其完善程度和落实力度亟待提高。

就社会文化而言,对于快递配送从业者的关注是缺失的。虽然配送是服务业的一环,是人与人直接打交道的行业,但是因其系统之庞大、任务要求之机械,该行业已然被符号化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环。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外卖小哥与快递小哥这一群体,而非穿梭于不同交通线路的鲜活个体。事实上,从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的称呼便可见得,快递配送从业者已被符号化,女性从业者、高龄从业者在此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面孔逐渐模糊。面孔已然模糊,关怀又从何谈起。此外,由于行业规范的缺失以及快递配送行业的必要性与即时性,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矛盾常被转嫁到消费链条的最终环节——配送员与消费者身上,冲突时常愈演愈烈,遑论关怀与体谅。社会关怀的缺失,加之背井离乡前往城市打工的孤独感,

---

①杨欣:《规制“新业态”?快递业产业模式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及法律管制调整》,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35期。

②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7页。

③吴旭龙:《我国快递行业法治化管理研究——基于对<快递暂行条例>的分析》,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导致从业者们社会融入感不强。调研指出,近半数从业者“感觉自己不属于城市”,甚至感到“自己在城市中总是低人一等”<sup>①</sup>。

而快递从业者自身,也对自己缺乏照料。他们被困于市场语境下优绩主义的图囿,希冀着自己的工作可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似乎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向好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内卷时代下,盲目竞争拔高了平均水准,但因资源有限,此举并不会给竞争参与者带来太多收益。该行业也是如此,多接一单、多送一天增加的收入是微薄的,努力算不得徒劳,但也收效甚微。其次,从行业整体看来,物流业的红利并没有给处于终端的从业者们带来等比例的收益<sup>②</sup>。可是,即使在这样的优绩主义困局里,快递配送从业者仍选择留下,一来是缺乏退出机制,就业的窗口难寻,快递业是同等准入门槛的工作中工资相对较高的;二来是执着的乐观的信念——正如一份田野调查里的采访对象所言,“为了老婆孩子,我累点也是可以的,就怕今后干不动了不好办。想多赚点钱今后能做点生意<sup>③</sup>。”积极与奋斗使快递小哥心中的主调,而从事这一行业也是几经权衡后充满希望的抉择。

三方面的困境,终于将快递配送从业者推向困难的境地,再难回返。其间缘由,看似不同,究其根源却是相近的——即市场逻辑的泛滥。

## 二、 困境的底层逻辑:市场无边界

### (一) 市场逻辑的溢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时代里,很多本不该被售卖的事物如今都已明码标价<sup>④</sup>。而人们对此也司空见惯,市场的逻辑悄无声息地被纳入我们的思维模式中。而其中,与上述困境的原因相对应的逻辑为时间定价、节约情感与人的异化。

时间定价意味着我们在给时间明码标价。“时间就是金钱”的暗喻自古有之,但今日,时间真正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为了节省在游乐园排队的时间,我们购买

---

①匡亚林、梁晓林、张帆:《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研究》,载《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期。

②劳动报:《两会特稿·完善“三新”职工权益已提上日程》,2018-03-14。  
<https://www.51ldb.com/shsldb/tt/content/eb193976-7562-480a-a09d-1f4bfede61b8.html>。

③浙江省团校课题组、蔡宜旦、程德兴:《生存理性视角下快递小哥的行为逻辑——基于浙江省快递小哥的人类学调查》,载《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7年第32期。

④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第V页。

快速通道票；为了接受更长时间的诊疗，我们开通医疗VIP；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我们把子女送进托儿所，为老人请护工。于是，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标上价码之后，两个怪诞的现象产生了。其一，因为时间的价值，偷闲成了挥霍与奢侈，精神生活的空间越发逼仄。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工作，但所得却无处可使——因为享受成了对时间的亵渎。其二，我们把太多的时间用于工作，而把本应陪伴家人的时间交给护工。而就护工而言，他们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大幅减少。没有人在自己的家人身边，参差的人情网络产生了错位，不得已走向淡漠。各行业对时间定价的广泛采纳造成了全方位的困境：这不仅是快递配送从业者在日复一日的“赶工游戏”里难解的题，更是“996”与“007”工作制下无数青年人的共同困境。

节约情感的理念是由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爵士提出的<sup>①</sup>。罗伯逊认为，“如果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就可以为节约……爱这种稀缺资源（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做出极大的贡献。”依据该观点，市场的运作是理性的、不消耗情感的。人们不应将利他心与爱在市场中挥霍，而应留给市场之外的温情脉脉。该观点看似怪异，但在时间定价的今日，由时间培育的爱已成为稀缺资源，节约情感或许已成为潜在需求。因此，在当今背景下，该理论或许能解释社会对快递外卖从业者关怀的普遍性缺失乃至市场整体的凉薄。

人的异化并非新兴观念，它源自马克思的《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本应是工人的本质，但被迫的强制劳动不能满足劳动需要，而沦为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人的精神能力变为维持其个人生存的手段，这便是异化<sup>②</sup>。这一概念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发扬。该学派学者埃里希·弗洛姆认为，异化的主动只是一种忙碌，事实上为“被动”，是无创造性的、虚假的主动<sup>③</sup>。放眼今日，在高强度的劳动与自我雇佣的谎言中，人很容易就会将自己物化、异化，接受半强制性、缺乏创造力与生命力的赶工，从而忽视对己身的关怀。

那么，市场逻辑为何如此泛滥？

## （二）市场逻辑的统治力从何而来？

---

<sup>①</sup>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第120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6-89页。

<sup>③</sup>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98页。

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是理性辩论的缺失。正如理论所分析的，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及其个性都面临丧失。异质性湮没于同质性中，人道无意识特征居于主导地位<sup>①</sup>。现如今，网上舆论多与己身利益息息相关，批评的靶子常常落于生产者侵权、消费者权益保护缺失等具体环节，且常带感情色彩，言辞常常过激。然而，鲜有人纵观全局，讨论体制本身，即市场逻辑的入侵。少有人注意到，市场的思维已经渗透到它本不该触及的领域，从而引发种种问题。

其二，即使理性的辩论发生了，也常因市场支持者的论点过强而不了了之。一种观点是，市场常年来被视作道德政治社会规范的对立面，交易本身是缺乏价值判断与情感色彩的。有人愿买，有人愿卖，交易达成，从功利主义视角来看，是双方各取所需的利益最大化过程。但并非所有事物均可纳入买卖的范畴，有时看似收益的双方其实均付出了道德或精神的代价。例如，时间标价贬损了享乐的愉悦，有偿献血消减了奉献的要义，更不必说器官交易等明显有违伦理的市场行为<sup>②</sup>。此外，还有另一种反对的声音称，“自我雇佣”符合劳动者的自由意志，但事实上，支付快递配送从业者工资的依然是平台或雇主，“自我雇佣”的概念并不严谨。而通过使用技术手段，平台公司看似放松了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并运用数字控制，削弱从业者的反抗意愿，蚕食其自由空间<sup>③</sup>。况且，就算自我雇佣为真，社会也应为他们提供保障，以确保他们最基本的权益——生命、自由与财产不受侵犯，而非被剥削、被控制，陷入困境。

正是上述原因，导致了市场逻辑的泛滥，从而引发快递配送从业者的困境。而该行业的困境又因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无边界进一步加剧。

### （三）市场无边界的恶果

首先，是不平等的加剧<sup>④</sup>。随着事物标价越发普遍，有钱亦更加重要，没钱则更加寸步难行。于并不富裕的快递配送从业者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不断工作，挣得收入，但是对种种需求的标价也越发普遍。在工资与生活费上涨的竞速中，他们能否胜出，这是一个问题。其次，是价值的腐蚀。金钱不仅物化

---

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陆泉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9页。

②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第102页。

③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5期。

④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第XI页。

了从业者的时间，更腐蚀了快递配送服务的价值。快递配送从业者的符号化，导致人们更倾向于把他们的工作视作理所当然，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每一趟的艰辛，乃至行业与技术发展对这个时代的馈赠。

困境如此，破局之法何在？

### 三、结语：破局之法

助从业者走出困境，一方面需借助法律的规范，另一方面亦需遏制市场的泛滥。前者的运行是一个从创制、实施到实现的过程，主要包括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使用、法律遵守等环节<sup>①</sup>，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方可实行；而后者则是从业者与消费者可以个体身份参与的。

从业者们应跳出市场逻辑的藩篱，反思自己劳动的价值，更合理地照料生活，提防自我的异化。“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反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sup>②</sup>。”劳动过程中，不仅应有西西弗斯式的乐观与坚韧，更应从工作本身寻得获得感与自我实现。埃里希·弗洛姆曾言，“以奉献和分享为己任”、积极地劳动，以使自己与他人的个性都充分地发展，这是人生最高的目标<sup>③</sup>。

而我们，即广泛的消费者群体，虽不能改变机制、为市场划界，但我们可以从思想做起，在下一次支付时思考：我购买的东西可以定价吗？赋予价格是否导致其价值的贬低？价格之外，这件商品还有什么价值？人道主义的点滴思考，不仅有助于明晰我们自己的生活，千万人的努力积累后，也有机会改变这个时代的困窘。而从实践上，我们亦可有所为——在下次收取快递或配送时，思考其背后网络的运转，对劳动者多几分关怀。在市场无边界的时代里，以爱与诚破凉薄的局。

---

①《思想道德与法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87页。

②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5页。

③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79-180页。